

先秦

政治体制史稿

肖宁灿 著

XIANQIN ZHENGZHI TIZHI SHIG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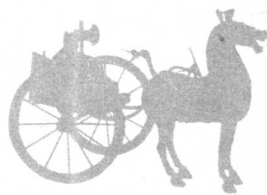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先秦

政治体制史稿

肖宁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政治体制史稿/肖宁灿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7-220-07359-5

I. 先… II. 肖… III. 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1324 号

XIANQIN ZHENGZHI TIZHI SHIGAO

先秦政治体制史稿

肖宁灿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孙 毅
文小牛
杨 潮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2mm

印 张

10.75

插 页

4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359-5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前 言

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不仅需要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方法，而且还应该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这是笔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既讲授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又讲授中国监察制度史之时就产生的想法。然而，因为时间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这样的想法十多年来都没有实现。现在，时间和有关的条件均具备了，以前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

可是，要同时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生、发展以及变迁的全过程，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因此，首先就只能研究其中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而先秦时期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生、发展以及出现大变迁的历史时期，所以，同时运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最有代表性。

现代的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大都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方法，但同时又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因此，就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怎样才算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

社会调查、社会统计等方法及技术，虽然为社会学家们所经常运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运用社会调查、社会统计等方法及技术，并不等同于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方法及技术等，本身不带有社会学的特色，因为仅



采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只采用政治学方法研究政治，同样可以运用社会调查、社会统计等方法及技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主要是指运用这门学科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是建立在有关的专门术语或概念的基础上的。社会学的方法论，当然就应该建立在社会学的有关的专门术语或概念的基础上了。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术语或概念，便是“政治制度”。甚至可以认为，“政治制度”乃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中心概念。可是，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政治制度”以及“制度”概念，自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倒是采用“体制”及“政治体制”概念，更为恰当。由于笔者有如此的看法，所以就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研究”，让“先秦政治制度研究”成为了“先秦政治体制研究”。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论，仅限于有关术语或概念的采用，肯定是不够的。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论，还包括合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野认识和观察问题，运用社会学的一些有关的理论去解释一些有关的问题，以及建立起一个具有浓厚社会学特色的研究范式等。笔者在研究先秦政治体制时，正是注意到了运用社会学的概念、理论、视野及建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所以本书才具备了同类著作所不具备的若干特色。比如，在书中就体现出了注重家与国的关系和进行社会结构分析，体现出了把政治体制的三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等特色。

本书与同类著作相比，不但能够体现出研究范式、分析框架等方面的区别，而且也体现出了对若干历史现象、历史事实的看法、解释和观点方面的差别。比如，关于传说中的治水及其与贡、与工的关系，关于商代和西周的军队中的“师”和“旅”，对于西周的“卿士寮”、“太史寮”和“乡遂制度”的看法，对于“世卿世禄”的看法，对于“御史大夫”大致设置的年代的看法

等，本书都有比较独特的见解。

笔者以为，本书确有一些创新的地方。但是，笔者从不否认，自己的研究是以前人和别的学者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阅读并参考了大量的相关的论著。因此，笔者十分感谢那些论著的作者。在书中，笔者对某些观点、看法，也提出了一些异议、批驳。而提出这些异议、批驳时，有时显得不够客气。为此，笔者恳请有关的专家、学者能够原谅。

不仅运用历史学、政治学，而且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史，这对笔者来说，想法虽然产生得较早，但仍是初次的尝试。所以，书中难免出现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为此，笔者也恳请专家、同仁，多多批评、指正。

2006年9月于六匠居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起源和现存的问题	(1)
二、本书以“政治体制”而不以“政治制度”为中心 概念的理由	(4)
三、体制系统的三要素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研究	(10)
四、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14)
五、政治体制与其他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	(17)
六、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先秦政治体制的基本类型	(21)
七、先秦政治体制系统中的次级体制	(24)
八、先秦政治体制的主要动态形式	(28)
九、关于先秦政治体制研究中社会学方法的运用	(31)
第一章 夏商政治体制	(35)
第一节 夏王朝以前政治体制的起源与发展	(35)
一、夏王朝以前中国远古社会的血缘群体与政治生活	(35)
二、战争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雏形的产生	(39)
三、宗教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特色的形成	(43)



四、治水与集权君主体制基础的奠定·····	(47)
五、对“酋邦”的几点看法·····	(57)
第二节 夏代政治体制·····	(61)
一、政治体制在大禹时代的进一步完备·····	(61)
二、世袭王权的出现和稳定·····	(67)
三、夏代的次级政治体制与职官·····	(71)
四、夏代政治体制的三要素和社会结构简析·····	(75)
五、夏代政治体制运行简析·····	(81)
六、夏代政治体制对后世的影响·····	(85)
第三节 商代政治体制·····	(86)
一、商王朝的建立与君主体制的进一步完备·····	(86)
二、商王朝的决策体制与职官·····	(90)
三、商王朝与方国、诸侯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 统治·····	(95)
四、商代的军事及军队·····	(98)
五、商代的礼与刑·····	(104)
六、商王朝的财政·····	(107)
七、商代政治体制的构成与运行简析·····	(111)
八、商代政治体制对后世的影响·····	(116)
 第二章 西周政治体制·····	 (119)
第一节 周王朝的建立与西周的君主制·····	(119)
一、周人与周王朝的建立·····	(119)
二、周初大分封制与等级君主制的完备·····	(124)
三、西周的君主继承制与宗法制·····	(128)
第二节 西周的决策与行政体制·····	(131)
一、西周中央王朝的决策及辅政体制·····	(132)
二、西周中央王朝的行政系统·····	(137)

三、诸侯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决策和行政系统·····	(143)
四、关于“王畿”和诸侯国的基层政权机构·····	(147)
第三节 西周的礼、刑与军事·····	(154)
一、西周的礼·····	(154)
二、西周的刑·····	(160)
三、西周的军事及军队·····	(165)
第四节 西周的官、爵与财政·····	(175)
一、西周的官、爵与“世卿世禄”问题·····	(176)
二、西周的贵族学校与选士之制·····	(181)
三、西周的爵禄与财政·····	(186)
第五节 西周政治体制的构成与运行简析·····	(191)
一、西周政治体制的构成及其有关特点·····	(192)
二、西周政治体制的运行及其有关特点·····	(198)
三、西周政治体制对后世的影响·····	(203)
 第三章 春秋战国政治体制·····	 (205)
第一节 君主制与军事体制的变迁·····	(205)
一、等级君主制的解体·····	(206)
二、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体制的形成·····	(210)
三、春秋时期军事方面的变化·····	(215)
四、战国时期军事方面的变化·····	(220)
第二节 决策与行政体制的变迁·····	(225)
一、决策及辅政体制的变迁·····	(225)
二、行政体制的变迁·····	(229)
三、基层政权机构的变化·····	(236)
第三节 礼、刑的变化与监察体制的形成·····	(240)
一、礼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变化·····	(240)



二、春秋战国时期刑与法的变迁·····	(245)
三、监察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	(252)
第四节 官、爵与财政体制的变化·····	(256)
一、职官系统的进一步完备与职业官吏集团的形成 ·····	(256)
二、选任与考核官吏方式的变迁·····	(262)
三、爵位、爵禄的变迁与官俸的出现·····	(269)
四、财政及赋税方面的变化·····	(274)
第五节 政治思想观念的变迁·····	(282)
一、政治思想观念变迁的总趋势·····	(282)
二、儒家的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变迁、发展·····	(291)
三、法家的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变迁、发展·····	(301)
第六节 大变迁后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状况简析·····	(317)
一、官僚政治体制及其主要特点·····	(317)
二、家、国关系与社会结构状况·····	(326)
三、官僚政治体制对后世的影响·····	(331)



绪 论

一、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起源和现存的问题

按照现在通行的图书分类法，本书是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因此，在其“绪论”部分，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起源、成果状况以及现存的问题着手进行介绍、探讨，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发端于什么时候，不少学者都认为是起源于古代。比如，左言东在所著《中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就认为，我国从西汉开始，就有体系完整的史书出现，以后历代的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书的编纂，一代一代延续下来，形成所谓“二十四史”。这些史书，以帝王为中心，以政治人物为主干，实际上证述的是一部政治史。这些史书，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在文化上的反映，大多有书、志、表等体例，如礼书、封禅书、兵志、刑法志、职官志之类，是对各种典章制度即政治制度的总结。唐宋以后，更有贯通古今的大型政书的出现，如唐代杜佑所撰《通典》、南宋郑樵所撰《通志》、元代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以及清朝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等，就是习惯上简称的“十通”。另外还有官修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历代职官表》等也属于这一类。宋以后又有根据文献资料辑录的某一朝代典章



制度的书，如《七国考》、《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等^①。

认为早在中国的古代就有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比如，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不但持同样的观点，而且还在题为“历代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录与考索”一节里，更详尽地列举了更多种类的著作或“著录”^②。该书内容并非仅限于此，在题为“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一节中进而认为，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随着一些较早接触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人们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的某些观点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的批判。由此，在中国出现了用西方资产阶级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萌芽^③。

此后，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确实多了起来，仅从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所列举的各种版本的书目来看，就完全可以称得上硕果累累。然而，该书的作者同时也看到了这样的事实：通观 20 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大体上是以历史学领域里的一门专史的形式而自立于学术界的，相当一批著作实际上是以“官制史”来代替政治制度史。由于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缺乏深入的认识，没有能从政治学的角度，把它当作政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来规范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例如，对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特征的国体、政体形态及其区别，首脑决策的依据、形式及贯彻，政体机

① 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12 页。

②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1 页。

③ 同上书，第 12～13 页。

制,行政管理职能、方式、方法与制衡关系,人才的铨选、考绩与升转,回避制度,行政效率,创新精神,应变能力等等内容,没有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论证,从而陷入“静态的缕述”和“平面的图解”,还谈不上建立起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科学体系^①。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到底该如何有所突破?白钢先生认为,“首先,是开拓新领域。从政治学的角度,在深入研究历代政体结构的基础上,着力于政体机制方面的探索”。白钢先生认为,关于政体机制,“即政权结构关系及其运行形式。它是通过对权力和政治行为的研究,来揭示政治制度的动态表现。换言之,加强政体机制研究,就是要正确揭示历代帝王如何处理皇权与官僚机构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关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等等”^②。

与以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著作比较,白钢先生这样进行构想,确实是有所突破。但是,如果再拓宽一下视野,就会发现其中的不足。比如,该书列举的涉及政权结构的关系,实际上都侧重于政治领域中的那类“正式的关系”,没有专门指出该领域中各种“非正式的关系”。事实上,各种与政权有关的非正式关系,对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政治生活、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的运行的影响,一直都是很大的。又比如,该书认为,要通过对权力和政治行为的研究,来揭示政治制度的动态表现,却没有明确指出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的运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总让人感到美中不足。而人的政治行为状况,又不仅仅受制于法律、法规等正式的规范,各种非正式的规范同样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候,有些非正式的规范或“潜规则”对人们的政治行为

①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4页。

② 同上书,第24~27页。



的影响还特别大。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非正式规范或“潜规则”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运行的影响，一直都是比较突出的。而注重对非正式规范、非正式关系和非正式权力等的研究，不是政治学家们所擅长的，却为社会学家所重视。这样看来，要进一步开拓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领域，还必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让研究者具备社会学的视野。

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需要社会学介入，白钢先生也已认识到了，只是将其与军事学、经济学等学科并列，未特别重视罢了^①。国内有的学者却不同，他们格外重视社会学的作用。比如，《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一文就认为：“传统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存在着内容单调、视野狭隘、方法老化、手段落后等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不利于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入。政治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人类政治生活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论对政治制度的诠释和分析模式，拓展了政治制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政治制度的动态图景，是研究政治制度的有力工具。”^②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该文的观点，只是认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除了应重视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外，确实还需要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特别需要把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放在与运用政治学、历史学方法同等的地位。

二、本书以“政治体制”而不以“政治制度”为中心概念的理由

怎样才能做到既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的方法，同时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呢？笔者以为，在进行研究时，除了必须运用历史学

^① 参见白钢《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② 曾育荣：《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2年第5期。

的方法外，还必须注重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所谓政治社会学，可以简要地界定为：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科学^①。而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关键是如何运用其方法论；把握和运用一门学科的方法论，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门术语或基本概念，便是其基础^②。

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认为“政治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或术语，甚至认为这个概念是一切政治制度研究的“中心概念”，均不过分。只不过“政治制度”概念又确实存在着问题。认为政治制度概念存在问题，应该说白钢先生已有所察觉。比如，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政治制度的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无疑束缚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而欲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能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是必不可缺少的。”^③但理论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理论上要有所建树，首先探讨一些特别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政治制度”一类的“中心概念”，是不应该缺少的。

在以前的中国史研究中，“典章制度”等倒是经常看到的语词，而“政治制度”却不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在一般的政治学著作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国体”、“政体”一类概念，极少看到“政治制度”这一概念。可是，在政治社会学中就不同了，“政治制度”在这门“边缘学科”中是使用得非常多的一个概念。前面已经谈到，政治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科学。因此，探讨“政治制度”概念，完全可以

① 肖宁灿：《政治社会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

② 同上书，第 34 页。

③ 白钢：《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在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在现代社会学中，“社会制度”或“制度”，不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①，而且还是这门学科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据说，“社会制度”或“制度”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最早使用^②。在英语中，其写法为 social institution 或 institution。虽然多数学者将其译为“社会制度”或“制度”，但也有人将其译为“社会建制”或“建制”^③，以及译为“社会设置”^④。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就以为，把 social institution 译为“社会体制”更好^⑤。后来，通过进一步研究，笔者坚持了这样的看法^⑥。为什么？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其语言含义的角度看，institution 既有包括习惯、风俗在内的规范的意思，又有机构的意思。而汉语的“制度”一词，无论是在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主要意思都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规定^⑦，或要求大家共同遵

① 在西方社会学中，多使用“制度”（institution）概念，在中国社会学中，多使用“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概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2 页。

③ [美] G. 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6 页。

④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4 页。

⑤ 任宝祥、肖宁灿主编：《社会学概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7～148 页。

⑥ 肖宁灿：《社会学引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7～318 页。

⑦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2 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64 页。

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①。因此，将 institution 译为汉语的“制度”，就只能具有其中的一种主要含义，而将其译为“体制”就恰当多了。所谓“体”是机构的意思，所谓“制”是规范的意思。其实，汉语的“体制”并非现代才有的新词，它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语词。在古汉语中，“体制”一词虽然有多种语义，但包括规范与组织双重含义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②。比如，在宋孝武帝的《重农举才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百官之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倾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众才成构，群能济业者也。可更明体制，咸责厥成，纠核勤惰，严施赏罚。”^③ 公元 1793 年，清乾隆王朝给英国使臣的所谓敕令内，亦有如此的说法：“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④

笔者还以为，把 social institution 或 institution 译为汉语的“社会建制”、“社会设置或建制”、“设置”，均不太合适。因为其中的关键词“建制”和“设置”两词，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作为动词用。不仅如此，要是采用这样的译法，相应地，institutionalization 就只能被译为“建制化”或“设置化”。称其为“建制化”或“设置化”，而不称“制度化”或“体制化”，总会令人感到别扭。

其次，从定义和相关研究的实际情况的角度看，也是把 institution 译为“体制”更合理。对于 institution，一部分社会学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756 页。

②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12 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4 页。

③ 《宋书·孝武帝本纪》。

④ 《东华续录·乾隆五十八年》。